

幸福的期待与文学的理想

——评姜贻斌长篇小说《火鲤鱼》

聂 茂

(中南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姜贻斌是文学湘军中的一个特色鲜明的作家。他坚持草根叙事,聚焦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细腻的笔触伸入社会的细小事件,凸显现实的冷酷和沉重。与此前的创作相比,其长篇新作《火鲤鱼》透露出更温驯、更柔和、更温馨的基调,尽管仍然有残酷叙事,但残酷中有亮色,有温暖;尽管仍旧有尖利,有撕裂,但不再直接,不再那么疼痛。作为一个内心极为敏感的作家,姜贻斌不断运用幻觉,不仅将幻觉的功能放大,而且将放大的幻觉反复出现在文本的细节处,使读者产生了幸福的期望,也使文学彰显了更高的理想。

[关键词]姜贻斌;《火鲤鱼》;草根叙事;温情;文学理想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3-0003-04

Happy Expectation and Literature Ideal

——Review of Jiang Yibin's Long Novel *The Fire Carp*

NIE M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Jiang Yibin is a distinctive literary writer in Hunan literature. He insisted on narrative about grassroots and focused on grassroots's daily lives. In his novels, the cold and heavy reality was highlighted by stretching the delicate strokes to tiny community events. *The Fire Carp* seems more gentle, softer and more intimate.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sharp, tearing in *The Fire Carp*, it's not so painful and direct. As a sensitive writer, Jiang Yibin repeatedly uses the illusion. He not only magnifies the features of illusion, but also amplifies illusion in the details of his novel, which always make readers engender happy expectations and demonstrates the higher ideals in literature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Jiang Yibin; *The Fire Carp*; narrative about grassroots; warmth; literature ideal

在文学湘军中,姜贻斌是一个特色十分鲜明的作家。他的绝大多数文本,都很接“地气”,坚持草根书写或原生态叙事,聚焦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他以细腻的笔触伸入社会的细小事件,用生动的笔墨描绘纷繁芜杂的琐碎生活,且多数故事都是悲剧,凸显现实的冷酷和沉重,娓娓道来的故事背后总有一种能够穿透纸背的锐利力量,引发人的关于公

平、正义和生存困境等宏大话语的深层思考。

例如,小说《枯黄色草茎》聚焦的是煤矿,是脏乱差的环境,但感觉很凄美,语言抒情色彩重,故事的前进也是靠个人强烈的情感来推动的,作品中“我”与张丽华的爱是那样的真实、沉重、朦胧而压抑。小说中,张丽华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作者本人不厌其烦地抒发一个少年的微妙而纯洁的情愫。据姜贻斌说张丽华的名字是真实的,生活中的确有这么个人。在当年,同学们的确是她安排跟姜贻

收稿日期: 2015-04-06

作者简介: 聂 茂(1970-),男,湖南祁东人,中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播学。

斌坐的,另外还有一个女同学,三个出身不好的两女一男坐一起,这不能不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见证。一直到现在,姜贻斌还在寻找张丽华,他不知问过多少同学,都不晓得她去了哪里。这种特定时代的爱情故事,浓缩着一代人的美好与遗憾。从《元八》开始,姜贻斌小说的叙事更加贴近泥泞而粗糙的大地,贴近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在生存困境重压之下,他们容易表现出一种畸形的道德体验和价值观念,这种畸型主要体现在小说主人公的行为法则和思维逻辑上。

对姜贻斌来说,2012年应该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原因是,小说《火鲤鱼》^[1]终于出版问世。从2001年4月开始创作,到2011年3月定稿,姜贻斌历披十载,前后修改八稿,可见,姜贻斌对这部作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想,姜贻斌应该是把它当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来看待的。作为一部家族叙事或者说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涉及的人物众多,似乎没有中心,又似乎大家都是中心,姜贻斌一会儿叙事,一会儿抒情,一会儿议论,一会儿对话,一会儿回忆,一会儿幻想,一会儿又回到现实。

在小说中,姜贻斌既冷静直观,又自言自语;既天马行空般女巫式写作,又处处彰显姜贻斌的文化自觉。总之,这是一部感觉怪异、难以归类的小说。从故事本身来看,这部作品实际的第一主角是叙事者我,以我和几个哥哥的故乡行作为切入,通过我为主线,揭开了堂哥、三国、水仙、银仙、车把、满妹、伞把、刀把、喜伢子、乐伢子、小彩、雪妹子、王一鸣、王老师、三妹子、苦宝、克山、王淑芳等一系列发生邵水河畔、鱼鼓庙和雷公山一带山民们的前世今生,说的是他们的苦难和生活,说的是他们活着的状态,而以“火鲤鱼”这一传说中幸福生活的代表为书名,正是全书内容艺术形象的高度浓缩。整个文本以“二十四节气”为章节,可谓独具匠心。每一章仿佛都是崭新的开始,独立的故事,实际上,每一个章节的故事、人物通过我的记忆、情感、思考和陈述,然后与时间发生微妙的时空反应,从而形成错综复杂又显得浑然天成的整体,勾勒出一幅关于农村过去和当下的浮世绘。

二

无疑,这是姜贻斌一直以来感性写作的一个突破,一次升华,或者说大胆创新。“我”是全书的聚光灯,也是全书的“发光源”,这不仅因为“我”是整部作品的主线,缺少了“我”,整部作品就彻底散架了,还因为“我”直接参与和见证了各个故事,是经

历者,更是书写者。“我”的情感、思考、幻想、陈述是作品的重要部分,“我”和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关系和故事也是作品的重要内容。而且,小说中的“我”与生活中的姜贻斌本人十分接近。

在阅读当过程中,很多印象和联想浮现我脑海中,每一篇起始的童谣、情歌总会让我想起别人作品的一些影子,或者所谓的互文性吧。例如小说的表现方式让我想起莫言的《檀香刑》;而小说中“我”的直接介入并穿起所有故事的设置又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某些情节特别是小说的荒诞上又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甚至围绕火鲤鱼而展开的时间追忆能让我联想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等。一部小说,引发我这么多的联想,而联想出来的对象又一定不是姜贻斌真正要去刻意模仿的,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风格上的杂糅,一种无意识的超前融合。

实际上,我更愿意从色彩上来谈这部小说。即姜贻斌呈现给我的最直接的阅读感受是,我面对仿佛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情感丰富、经历特殊和技巧娴熟的高明画家,他用淡淡的素描甚至是印象性地勾勒出一幅山水画,或轻描,或浓墨,或写意,或勾勒,再配上悠长悠长的充斥着淡淡乡愁和浓浓乡情的清新文字,构成一幅新时期另类而又别致的清明上河图。

同时,我特地注意到,相比姜贻斌从前的诗意和感性写作,《火鲤鱼》透露出更温驯、更柔和和更温馨的基调,尽管仍然有残酷叙事,但残酷中有亮色,有温暖;尽管仍旧有尖利,有撕裂,但不再直接,不再那么疼痛。我想这不仅因为姜贻斌投入了太多的情感,而且懂得了节制,懂得了内敛。姜贻斌明白静水流深的道理,也明白海明威“冰山理论”的可贵。

我喜欢为内心而创作的作家。在我看来,姜贻斌的这部作品就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在小说的后记中,姜贻斌写他们兄弟到蔬菜场看望老邻居时,他大哥对他说了几句话,“你要写个长篇嘞。”就是他这句话,突然让姜贻斌冲动起来,几十年的点点滴滴一齐涌现在他脑子里。在此,我想把姜贻斌与韩少功进行简单的比较。

同样是表现痛苦,但韩少功作品中所表现的痛苦,是一种绝望的痛苦,要走出这种绝望,需要毁灭。例如《爸爸》和《女女》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在韩少功的意识中,那些痛苦无法忍受,我们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或者发泄的渠道,所以韩少功的痛苦在我看来很像是倾覆般的激动,或者说在他那里痛苦和激动水乳交融了。^[2]即便是我最喜欢的

是《日夜书》，它表达了至高无上的单纯，可这种单纯里，也流露出深切的痛苦和绝望。在韩少功的作品中，既是个人的绝望，也是对整个世界人类的绝望。

但同样是表现绝望，姜贻斌表现的是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而且他们的民族性都是通过强烈的个人性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姜贻斌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感伤的怀旧，纤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得非常真诚。之所以做得如此自然，是因为姜贻斌的表现是从他自身出发，也就是从人的角度进入社会，而不是从社会出发来进入人。

三

我们知道，在艺术海洋里，情感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它就像是海底的暗流一样，而技巧、思想和信仰等等，都是海面的波涛，波涛汹涌的程度是由暗流来决定的。读姜贻斌的《火鲤鱼》，使我想到许多著名哲学家晚年所写的随笔，其力量不是愤怒和激动，而是深入人心的亲切。作品的主人公虽然经历无数的苦难，可是他们不仅不抱怨，甚至连抱怨的想法都没有。这样平凡中的伟大，尤其令人敬重。

也正因为此，《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顾建平说，《火鲤鱼》让我们看到姜贻斌文学之路的另一个秘密通道，看到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对他此后人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小说用二十四节气铺排故事，有散文般的抒情气息，又有地老天荒的宿命感蕴含其中，小说放出巨大的情感冲击力，有它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3]

姜贻斌在平淡的书写中，努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显得很从容、很内敛。明明情感汹涌，他表现得心平如镜。他甚至通过声音或留白来表现情感的冲击。例如，在《火鲤鱼》中，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我蹲下来默默地低头看着，渐渐地，耳边隐约地响起她们的笑声，那一定是打宝卦时的爽朗开怀的大笑。我还听见她俩的喁喁私语，像鱼喋水。甚至，我还听见石片落地的清脆声音。就是那种唯有宝卦才能发出的声音，将她们出去的信心鼓动了。我不知她们是否想过，以后要来这个密谋之地看看，来寻找那两块鼓舞着她俩出走的沉默的石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两块薄薄的石片鼓动了她俩，让她俩改变了自己的生活。”^{[1]55} 在这里，“我”用回忆的喧嚣来反观现实的沉默，在回忆中，那么多的声音，那么多的场景，那么多的细节一一向“我”走来，逼真，生动，而“我”只能“默默地低着头”，看着“沉默的石片”。这是对过去岁月的追

忆，是抚摸，是触碰，是对两个山女怀揣卑微的心愿走向山外世界的敬重与回望：“我”既庆幸她俩走出了大山，又担心她俩走出大山之更为艰难的生活，它表达的是作者的底层视角和人文情怀。类似的描写还有：“我们的叫喊声在鸡精的沙洲上像波浪翻滚，震动着美丽的夜色。我们的诉说声，则像是喁喁私语的琴声，抑扬顿挫地在空中回荡，然后，飘向神秘的远方。”^{[1]86} 这样的描写同样很有艺术质感，温润如玉，情感细腻，饱满逼真，扣人心弦。读到这样的文字，仿佛有一根细细的鹅毛在轻轻撩拨读者心灵深处最脆弱的部位，热闹之余透露出淡淡的伤感。如果是一个紧张的故事描写，读者看过后，紧张的琴弦绷紧一下，随后也就释放了。但这样的文字有较强的“意义增殖”，即文字与意义不是对等的，意义远远大于文字本身。在这部长篇中，这样的叙事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大面积出现。甚至，在《霜降》这一章，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却聚焦邵水河的汛期，以此展开对青春年少的淡淡追忆，或者说，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祭奠，是珍藏于胸的对生命原初的一份情愫，这样的追忆、祭奠和情愫，是人类共有的，因而容易引读者的起共鸣。这样的书写让我联想到沈从文和汪曾祺。沈从文说：“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在政治旋涡之外”。余秋雨在评张爱玲时说，读了张爱玲的作品，他感到庆幸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不带火焦气息”的作品。台湾作家施叔青在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时指出，他“强调小说的重点不在于讲故事，因此情节的安排被认为很次要”；不仅如此，他甚至“故意把外在的情节打散，专写些经历过的人与事。”这些前辈作家都尽力远离政治，尽力美化乡村生活，认为乡村的诗意更接近艺术的本质，因此，当他们向未曾物化的原始乡村唱上一支挽歌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把情节置于边缘位置，推动文本前进的是一种隐约可见、似有似无的东西，这种东西带来一种情绪，一种感伤，一种深沉的力量。姜贻斌自觉地传承了前辈作家的艺术创新，甚至为了表现一种生活的本质，他不断运用幻觉，不仅将幻觉的功能放大，而且将放大的幻觉反复安置在文本的细节处。这种表现手法被姜贻斌运用得地道娴熟，在他的新作《火鲤鱼》里同样使用了这种表现手法。

四

一个作家告诉我，他很想写一个类似《火鲤鱼》一样的小说，即将小时候所有重要玩伴的前世今生都写一写，以散文、日记、电报、新闻、游记、特写和公文等大杂烩式的叙事，着眼于每个人的日常生

活,将个体生命置于时代大潮中,追求非常态的命运结局,但这个作家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统领全书的主线,同时感觉这种碎片化的书写难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认为这样写是一种冒险,因而起笔多次,最终还是放弃了。与这个作家不同,姜贻斌甘愿在艺术上冒险,并最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蓝本。姜贻斌在后记中颇为自得地说,“在这部长篇中,我想以一点诗意的文字来完成它。我还想在结构和形式上,以及写作手法上有一点突破,尽管我做得还不够好,我却是尽可能地去做。在写作过程中,我是很放松的,甚至还有一点随意性。许多的想法,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一开始,我并无多少整体上的构想。”^{[1]332}显然,姜贻斌所谓的随意性并非随意,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意安排。

在阅读《火鲤鱼》过程当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这种随意性填充了章节之间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可能断裂。姜贻斌的这部作品甚至让我想起马原式的“活页小说”,即读者不一定从书的头一页开始阅读,而是可以从任何一页读下去,也可以打乱排版顺序,从一章跳到另一章,从中间闪回到前一节,也可以从后面往一直前面阅读。换句话说,如果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是骨头,那么,姜贻斌的“活页式”的诗意语言就是肉,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连结“活页”之间的筋脉和血脉,这样,靠读者的参与和读者自身生活的吻合实现小说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姜贻斌的中短篇小说大都写得厚实、平实和老实,虽有一定的先锋色彩,但更多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套路。但长篇小说,好像成了姜贻斌的试验场,姜贻斌总会不安份,总想弄出一点新花样。这从姜贻斌的《左邻右舍》可以见出。《火鲤鱼》同样充满着先锋的元素。也许,这就是姜贻斌不轻易动笔写长篇小说的原因?

诚然,任何开拓性的文学试验都具有冒险性,作为一个成熟作家,这种风险有可能给姜贻斌带来莫大的荣誉,但也可能成为姜贻斌文学征途上的“滑铁卢”。坦白地讲,我在阅读《火鲤鱼》时就经常迷失在澎湃的诗意中,而忘掉故事本身;同时,我也要经受着纷繁杂乱的散文化语言的考验,很多时候因为大篇幅的无情节描写而让我痛苦得读不下去。总的来说,这部作品充斥了太多属于作者个人的经验和记忆,许多情节一定是真实地发生在姜贻斌身上,因而它是一部很个性化或者很私人化的产物。

对此,姜贻斌认为:现在的作家太现实、太功利了,他们在写作时,首先考虑的是读者,是市场,是否能够出版等等,没有一种为艺术献身的决心,没有一种文学理想。的确,当下许多作家,包括一些非常出名的作家,他们都不是努力培养和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而是向市场投降,迎合一些读者低级的趣味,津津乐道于发行量和转载率,十分得意于电影或电视的改编,以及聚光灯的照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现实。姜贻斌提请我们不要忘记中外许多经典作家,他们为了有所创新,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时间。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等作家,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特别是卡夫卡,因为当时的读者无法接受他的思想的前卫、风格的新潮和艺术的先锋,所以,他的小说很难发表。卡夫卡曾自己就印刷一些书,放在一家书店代卖,100本。第二年他去看,仅仅卖出了11本。再一看,其中有10本是自己买的,那都是送给朋友们的。换言之,这个书店一年来只卖出了一本卡夫卡的书。^[4]当然,作家当时很沮丧,但他并没有沉沦,更没有转向市场,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普鲁斯特的境况也跟卡夫卡差不多,最后,是时间老人给了卡夫卡和普鲁斯特颁发了勋章:他们都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派作家,他们死后出版的作品影响了无数的作家,包括许多中国作家,包括姜贻斌本人。因此,先锋小说的小众化跟大众阅读经验并不矛盾,而是各取所需罢了。问题不在于读者的变化或欣赏趣味,而在于作家本身,即你是为什么写作?你是否想给文学提供新的可能性?你是否拥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并愿意为之而献身?我想,在《火鲤鱼》中,姜贻斌对这些问题都有过很好很深的思考,因而,如同这个作品名字的象征意义一样,我们有理由对《火鲤鱼》进行幸福的期待。

参考文献:

- [1] 姜贻斌. 火鲤鱼[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 [2] 余华. 重读柴可夫斯基[EB/OL]. [2015-03-18]. <http://www.classical-music.cn/archives/2408>.
- [3] 顾建平. 姜贻斌的小说特质[J]. 长篇小说选刊,2013(5):1.
- [4] 聂茂. 隐秘的愉悦与悲悯的力量——对话著名作家姜贻斌[J]. 湖南文学,2015(3):160-167.

责任编辑:黄声波